

# 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 让老百姓安全感满满

## 核心提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首位。就社会领域而言,近年来,我市切实落实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把防范打击犯罪同化解风险、维护稳定统筹起来,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本报首席记者 黄乔

前不久,市高法院举办“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揭牌仪式,并聘任时代楷模马善祥为“重庆法院多元解纷业务指导专家”。

马善祥是江北区观音桥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老马工作室”负责人,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马”。扎根基层三十多年,老马成功化解大量矛盾纠纷,为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做了大量工作。

“揭牌仪式后,我市法院将全面设立‘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市高法院相关负责人说,全市法院将以“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整合驻院调解力量,强力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诉前纠纷化解。

在人民法院设立“老马工作室”,拓宽第三方参与矛盾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只是我市围绕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之一。

近年来,我市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源为着力点,持续深化“枫桥经验”重庆实践,切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水平。

据统计,去年,全市各类调解组织累计受理矛盾纠纷35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7%。全市群众安全感、政法队伍满意度、司法公信力分别达到99.17%、97.09分、97.28分,再创历史新高。

## 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主线 完善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

“本以为这场交通事故必须走诉讼程序,不晓得要整好久!”前不久,在云阳县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法院调解室里,市民王女士(化名)当场签下调解协议后说,她本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次纠纷一没花钱,二没走繁琐的流程,“现过现”就解决了!

原来,王女士曾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受伤,出院后因伤残鉴定等级问题与保险公司难以达成协议。

“我本来是到法院来起诉保险公司的。”王女士说,到了法院才得知重大矛盾纠纷人

## 公平公正 依法调解 有情有义 通顺思想



马善祥在“老马工作室”调解居民纠纷。

(资料图片)

民调解委员会已经进驻法院,交通事故、医疗和物管纠纷都可以在诉前调解解决。

其实,在我市,这样的调解室不仅入驻了法院,还进驻了派出所、来访接待中心,形成了诉调对接、警调对接、访调对接的“三调对接”社会矛盾化解新体系。

“新的社会治理机制导入后,全市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的稳定和谐,都呈现了新局面。”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主线,将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建设作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重要内容,推动司法、公安、法院、信访等部门进一步健全落实警调、诉调、访调“三调对接”机制,加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调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该负责人说,具体来讲,为加强“警调”对接,我市在基层警力20人以上派出所设立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派出所调解室,推进人民调解员进驻公安派出所调解矛盾纠纷。

在“诉调”对接方面,则推动区县重大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派员进驻基层人民法院,接受法院委派、委托,通过诉前委派人民调解、诉中委托人民调解、诉后执行和解等方式开展调解。

在“访调”对接方面,我市将人民调解贯穿信访受理办理全过程,推动区县设立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或在区县信访部门群众来访接待中心设立“派驻人民调解室”。

此外,还推动检察机关依法建立健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明确民事行

政申诉案件引导当事人和解的条件、范围、程序,努力推动矛盾纠纷化解。

“三调对接”机制的建立,是对我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该负责人说,其程序便捷、方式灵活、立场中立的独特制度优势,已成为重庆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 打造集约型综合调处中心 矛盾纠纷化解“只跑一地”

“发生纠纷,你去医院闹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们小区的纠纷,物管方面肯定要负责任!”

日前,记者在荣昌便民纠纷解决中心大楼里看到,这里分别设立了家庭、医疗、征地拆迁、物业等30多个调解室,部分调解员正在为群众现场调解矛盾纠纷。

据了解,这是荣昌区为进一步方便群众“一站式”解决矛盾纠纷,在原有综治处基础上新建的便民纠纷解决中心。

该中心有30多间调解室,可将群众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纠纷“一网打尽”,群众遇事心平气和,“只进一门,只跑一地”。这里也成为荣昌区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集散地”和“大本营”。

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着力打造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矛盾纠纷综合调处平台,逐步建成由党委政法委统筹,公安、司法、法院、检察、信访及矛盾纠纷比较集中领域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

参与的矛盾纠纷综合性集约型调处中心,并通过信息化智能化运用,形成矛盾纠纷集中统一受理、分流交办、督办、反馈、考核的闭环工作流程,努力实现矛盾纠纷受理和调处“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 持续深化“枫桥经验”重庆实践 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前沿阵地。那么,如何在基层构筑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防线?重庆结合自身特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通过开展深化“枫桥经验”重庆实践十项行动,回应群众期盼,切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水平。

前不久,沙坪坝区回龙坝镇聚龙城社区主任何雨娟接到物管的电话。原来,小区里发生了一起流浪狗咬人事件,被咬伤孩子的母亲情绪激动,找到小区物管要求赔偿。

“不要着急,我们去社区的和顺茶馆喝茶,坐下来慢慢谈!”何雨娟没有马上参与到事件调解中,而是主动邀请双方到和顺茶馆“喝茶”,并请来调解员、律师和陈家桥法庭的法官共同参与其中。

几口茶后,孩子母亲的情绪平静了不少。最终,经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物业承担80%的医疗费用,孩子家长作为监护人承担20%的费用。

和顺茶馆里的一杯清茶,化解了这场矛盾纠纷。这个神奇的“茶馆”位于沙坪坝区回龙坝镇聚龙城社区,如今已成为当地不少居

民调解纠纷的第一选择地。

“和顺茶馆其实是沙坪坝区立足辖区实际,打造的一个基层社会治理的综合体。”该负责人说,该茶馆集矛盾化解、民意沟通、法治宣传、法律服务、心理疏导、公益服务、文化生活七大功能于一体,为社区居民搭建起上传下达的桥梁和沟通交流的平台。

近年来,我市各区县按照“政府搭台、社会参与、群众受益”的模式,结合基层党建、基层群众自治、基层协商民主、基层矛盾调解等工作开展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实践创新,总结形成了“三事分流”“楼栋工作日”“老杨群工”等典型经验,努力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

##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奏响凯歌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关键是要以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为目标,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2020年,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奏响巴渝凯歌——截至今年3月,全市共侦办涉黑犯罪组织17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和团伙251个,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3573人,破获涉黑涉恶案件9343起;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308件409人,我市社会生态、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明显改善,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城口县蓼子乡茶林村,曾是当地出名的社会治安重点挂牌整治区。2016年至2017年,该村社会治理成效不佳,相继发生两起盗窃案和一起纵火案。

“连续发案,让人觉得我们村治安不好。”茶林村一组村民杨天说,那段时间,他每晚睡觉前,都要反复确认门窗是否反锁。

“自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我们通过一系列举措,去提升该村的社会治理水平。”城口县蓼子乡政法书记张维周介绍,系列举措包括由乡负责人带队联合片区派出所定期到茶林村召开院坝会,进村入户走访了解治安情况,排查安全隐患;安排派出所民警进行治安巡逻排查……

很快,茶林村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发案数降为“0”。如今,该村不仅摘了牌,还成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示范村,群众安全感得到普遍增强。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基层社会治理结合起来,重点打击群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和各领域突出问题;大力推进基层治理创新,加强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排查,进一步完善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组织体系和社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联防体系,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 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开启重庆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申晓佳

6月18日重庆海关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3047.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同)增长39.9%。其中,出口增长42.6%,进口增长35.6%。

数据令人振奋。它表明重庆对外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

说起重庆的对外开放,1983年是重要的起点。这一年,重庆被中央确定为全国首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下称改革试点)大城市,开始直接出口。当年出口额超过2000万美元。

重庆改革试点,包括3项重大任务: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民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如何组织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

自此,重庆经济开启了新的篇章。

## 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推动开展试点 历史性机遇落在重庆

“重庆改革试点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推动下开展的。”重庆市政府原参事、原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马述林说。

马述林是重庆改革试点的亲历者。他告诉记者,重庆改革试点受到各方高度重视。1983年上半年,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先后3次召开重庆经济体制改革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会,部署相关工作。

为什么改革试点如此受重视?马述林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用传统的行政条块组织来管理经济,客观上束缚了城市的发展活力。改革试点是中央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其目的



1990年,江北机场建成投用。

通讯员 许可 摄/视觉重庆

正是搞活城市经济,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在此背景下,全国改革试点为啥首选重庆?首先,重庆在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其次,重庆曾两次被列为计划单列市(即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再次,重庆当时是非省会的特大城市,经济关系复杂。

同时,当时,重庆在全国经济版图中已经占据不小的份额。1980年前后,重庆工业固定资产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于第五、六位,工业总产值居第七、八位。当时重庆工业总产值占四川四分之一,西南六分之一。

马述林表示,这些情况,使得重庆在全国有一定典型性、代表性。这也意味着,重庆的改革试点,将为全国城市摸索出新路子。

## 重庆经济发展更为自主 为全国提供了一批新的探索成果

改革试点启动后,重庆经济发展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以江北机场为例。2020年,江北机场正式通航30年,实现旅客吞吐量3493万人次,位列全国第4。而鲜为人知的是,江北机场在重庆第一次总体规划中,曾被列为2000年后建设。江北机场能“提前”诞生,就得益于重庆改革试点。

马述林介绍,重庆改革试点的改革主要包括4个方面: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中央和省属企业下放、实行市带县体制。

其中,计划单列,意味着重庆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基本上由政府统筹协调,重庆与中央直接衔接;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意味着重庆可以自主安排中长期发展;中央和省属企业下放,意味着由市管理过去归属中央和省的企业意味着市可以统筹安排全市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实行市带县体制,意味着重庆走上了“城乡大联合,城乡共发展”的道路,加快了区县经济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作用,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

换言之,重庆发展经济,从此可以自己拍板干大事。

重庆计划单列后,1984年,投资预算2.6亿元的江北机场立项建设。1990年江北机场正式通航,1992年的年旅客吞吐量就突破100万人次。1995年,江北机场被正式批准为对外籍飞机开放的口岸,对上世纪90年代重庆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更重要的是,重庆改革试点不仅惠及本身发展,也为全国提供了一批新的探索成果。

1983年至1987年改革试点期间,“第一个吃螃蟹”的重庆,开展一系列探索:进行“利改税”和工资奖励制度改革;探索军民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进行老企业技术改造;改革外贸体制,打通长江通道,发挥重庆内河外贸港口作用;以城市为中心合理组织商品流通,进一步搞活经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撤销行政性公司,推进厂长(经理)负责制、完成“利改税”两步走、“抓大放小”、开展以企业为主体的改组联合等。

“重庆这些做法,当时在全国走在前列,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马述林说。

## 改革试点带来综合效益 试点期间经济增速超过前32年

6月10日,长江流域智慧管理“核心大脑”——长江模拟器落地广阳岛。未来,长江模拟器将建成国内外首个大型流域水系统综合模拟与调控科学装置。

探索、创新、敢为天下先,这些关键词是重庆城市气质的写照。30多年前,在没有前例的情况下,重庆的改革试点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其效益却令全国瞩目。

马述林介绍,1983年至1987年改革试点期间,重庆的综合改革试点方向与全国改革的大方向一致,与市场经济趋向一致。

例如,从重庆完成3项改革试点任务的情况来看,在搞活和开发西南经济方面,重庆提出了“西南一片、长江一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发展;在探索军民结合的新路子方面,到1987年,嘉陵摩托、建设摩托等一大批军工企业开发的民品已成为全国名牌;在组织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方面,改革试点期间,重庆区县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市的平均速度。

党史资料显示,在改革试点期间,重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由1982年的67.2亿元增加到1987年的135.1亿元,年均增长14.1%,略高于全国同期水平,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前5年和前32年。重庆全市干部群众对改革事业充满热情,干劲十足。

马述林认为,这场改革试点还为1997年重庆直辖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培养了人才。

改革,永无止境。今年5月,重庆成为新增的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之一。下一步,重庆将围绕构建高效运行的科研体系等4项重点改革任务,注重将全国共性问题与地方个性问题相结合,借鉴先进省市经验,谋划改革举措,解决制约创新的痛点堵点问题,让全面改革创新成为科技创新动力引擎,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